

资本的冲动

世界深层矛盾根源

李逆熵 著



Impulsive Capital

《21世纪资本论》细致无遗，从汗牛充栋的税务数据总结资本主义造成高度不平等的主因。
《资本的冲动》高屋建瓴、大开大合，把资本主义置于人类发展史的宏观架构中对照分析，
试图揭示“世界深层矛盾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

资本的冲动

世界深层矛盾根源

李逆熵 著

Impulsive
Capital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的冲动: 世界深层矛盾根源 / 李逆楠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9
ISBN 978-7-5699-1109-1

I. ①资… II. ①李…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7046 号

本著作中文简体版透过成都天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 经经济日报出版社 (香港) 授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独家出版及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 任意复制转载。本著作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字: 01-2015-4548

资本的冲动：世界深层矛盾根源

著 者 | 李逆楠

出 版 人 | 杨红卫

策划编辑 | 胡俊生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余荣才

装帧设计 | 程 慧 王艾迪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1000mm 1/16

印 张 | 16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109-1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 论证篇

- 第一章 人类早期的社会经济活动 / 003
- 第二章 “压迫”与“剥削”的历史 / 009
- 第三章 市场经济与利润的起源 / 016
- 第四章 货币、利息与金融的崛起 / 022
- 第五章 工业资本主义：利润何来？ / 030
- 第六章 四个不等式 / 044
- 第七章 劳动力商品化的后果 / 054
- 第八章 资本扩张的内在逻辑 / 067
- 第九章 资本扩张的深远影响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 078
- 第十章 资本扩张的深远影响
——从经济危机到生态灾难 / 086
- 第十一章 国家扮演的角色 / 097

第二部分 | 历史篇

- 第一章 商贸资本主义简史 / 107
- 第二章 欧洲封建制度的兴衰 / 111
- 第三章 新航道开辟与全球掠夺 / 115
- 第四章 圈地运动与无产化 / 121
- 第五章 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 / 126
- 第六章 金融与债务的崛起 / 134
- 第七章 科技爆炸与物质丰盛 / 143
- 第八章 自由民主与现代性 / 150
- 第九章 全球化下的战争与和平 / 159
- 第十章 革命与改良的失败 / 168

第三部分 | 未来篇

- 第一章 历史并未终结 / 179
- 第二章 “第二次分配”与“公共物品” / 186
- 第三章 深层次的经济改革 / 200
- 第四章 从市场监管到社会企业 / 214
- 第五章 从“约制资本”到“经济民主” / 220
- 第六章 环境灾难与“后增长繁荣” / 228
- 第七章 重建方略 / 242

结语 / 248



第一部分

论证篇



你选择蓝色药丸还是红色药丸？

——摩菲尔斯（Morpheus）问尼奥（Neo）

电影《黑客任务》（Matrix, 1999）中的对白

市场交易有两大类：一类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则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制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

——布罗岱尔（Fernand Braudel）

没有了经济增长，资本主义便会死亡；经济继续增长，大自然便会死亡。这是一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斗争。

——李察·摩斯（Richard M. Mosey）

第一章

人类早期的社会经济活动

“

领导者和统治者的主要分别是什么？

”

在生物分类中，人类属灵长动物（primate）。这种动物包括狐猴、猴、猿、人类以及它们的直系祖先。最早的灵长动物在六千万年前（即恐龙灭绝后不久）便已出现，相信是由原始的啮齿类动物（即老鼠、松鼠等的远祖）演变而成的。

灵长动物皆有群居的生活习性，但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则各有不同。以猴类中的狒狒为例，它们通常以大约五六十只为一群四出觅食，而群队中有严格的权力组织架构。带头的通常是群中最勇猛健壮的一头雄狒狒，动物学家把它俗称为“雄性头领”（alpha male），然后是它的家眷（妻妾群和子女）。帮助头领率领其他成员的狒狒则被称为“二当家”（beta），它们在头领年迈力衰时，会起来取代它的位置。由于头领可能未想让位，而二当家亦可能多于一只，其间便会出现权力斗争的情况。但正如动物界其他纷争（如争夺地盘或配偶时）一样，即使其间涉及武力，也只会出现受伤而极少会出现死亡的情况。

人类进化与权力架构的关系

在进化上与人类更为亲近的猿类如褐猩猩（orang-utan）、大猩猩（gorilla）、倭猩猩（bonobo apes）、黑猩猩（chimpanzee）等，其群落组织虽然在细节上各有分别，但在总体的权力架构（dominance hierarchy）上与上述的狒狒大致相同。

权力等级架构其实不独限于灵长动物，在其他较高等的群居生物如狼群中也同样存在。不用说，这种架构完全是进化的产物。简单的逻辑是，同一物种的两个群落如果一个有领袖带领而另一个没有，那么在活动领域和争夺竞争的过程中，后者因为缺乏一个首领发号施令而合作松散，很快便会被有领导、有组织的前者所征服或淘汰。

笔者之所以作出这些描述，是想指出按照生物学家的研究，再加上人类学家过去数百年对世界各地仅存的原始部落的观察，我们有信心推断，在人类早期的演化过程中，以“权力分配”为主的政治关系出现较早，而以“物质资源分配”为主的经济关系是随后而来的结果。

诚然，即使在这种原始的生活状态，政治与经济也已密不可分。作为领袖的个体和它的家庭，以及作为领袖助手的二当家（甚至三当家），在资源分配期间自然拥有一定的特权，包括择偶的优先权、在觅食中获得最美味的食物，以及在休憩时获得最舒适的位置等。

纯粹从动物生活习性的科学角度看，上述的情况是自然界演化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是“超越道德”，亦即没有所谓“错”与“对”的。但自从人类的祖先逐步发展出高级的意识、高级的感情、高级的思维能力和高级的道德观念以来，我们无可避免会对每种事物做出“是”与“非”的判断。当然，这种判断会受到时代的很大局限，例如在推翻帝制之前，即使如何改朝换代，人们总觉得世袭的帝制是天经地义的。而到了今天，财富的世袭仍然被看成是天经地义。但无可否认的是，“是非判断”会随着时间超越种种局限

而不断深化和广化，这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让我们回到人类早期的历史上。据科学家的研究显示，人类的远祖在七百万年前便与黑猩猩和倭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人类活动的范围只局限于非洲。约于四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懂得直立行走。而约于二百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懂得大量制造各式的石器工具。约一百万年前，部分人类祖先开始懂得用火，并选择离开非洲，其中一些更到达中国的北部成为我们熟悉的“北京猿人”。但按照科学家的深入研究，这些古人类并没有留下后代。现存的所有人类，应该是由一支十五万年前左右才离开东非的古人类逐步演化而成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形成

在数百万年的历史中，人类主要靠采集维生。采集的对象包括各种植物的果实、种子和根茎部分，临水（海、河或湖）的也会包括贝类、鱼、虾等。在以往，我们以为猿类都是素食的。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褐猩猩和大猩猩固然以素食为主，但黑猩猩（以及后来发现的倭猩猩）的杂食程度则较我们之前想象的大得多。它们除了捕捉一些小动物如昆虫与蜥蜴以果腹外，间中更会组织起来捕猎一些猴子来进食。

另一方面，在黑猩猩群落之间，偶然亦会因为地盘或资源的争夺而出现小型的“战争”，其间也会导致伤亡。科学家相信，人类的祖先在未完全离开森林之前，其生态习性与今天的黑猩猩（彼此的基因分别少于2%）应该相差不远。

过往，人类的祖先每每被描绘为“伟大的猎者”，但科学家的研究显示，捕猎小动物是一回事，捕猎大型的动物又是另一回事。考虑到人类的体型、力气和缺乏尖牙利爪，要捕猎大型的动物，必须有待我们懂得制造远程投掷的武器（如长矛和弓箭）以及拥有高度的组织能力（甚至雏形的语言）

才可成功。按照估计，狩猎成为人类主要的谋生活动，可能只有短短数十万年（而非数百万年）的历史。

对于我们习惯以千百年来看待历史的人，数十万年当然绝对不短。事实上，按照人类学家的推断，这种维持了数十万年的“采集—狩猎型社会”（gatherer-hunter society）^①对人类习性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例如我们喜欢吃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便是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倾向（不幸地对今天“四体不勤”的我们已不合适）。而男性以狩猎为主，女性则以采集为主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也由这段历史所强化。研究显示，虽然女性的采集所得才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可能高达日常所需热量的九成），但由于狩猎所得的肉食含有丰富和高质量的蛋白质，所以历来都受到高度珍视。而肉食分享（中国人的“太公分猪肉”）亦成为了世界不同民族在喜庆节日时的重要族群仪式。

大约一万三千年前，地球最晚近的一个冰河纪开始退却。在回春的大地之上，人类的演化展开了崭新的一页。世界各地的人民先后开始对各种动物和植物进行驯化，结果便是畜牧和农业的诞生。到了一万一千年左右，人类开始进入农业革命的时代，最初的城镇开始出现，古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让位给考古学的研究。

畜牧和农耕是两种十分不同的生活方式。前者要逐水草而居，亦即必须按季节性的大地变化随着牲口来回迁徙。后者则必须守着庄稼待它成熟，其间要防范动物的破坏和别人的偷窃。也就是说，务农者必须选择定居。从此，人类分为游牧民族和定居的农业社会，而两者的冲突（特别是当游牧者

① 狩猎采集是一种通过猎捕动物和直接采摘可食用果实的生存技能，而不太靠驯养或农业的生存状态，并可能是人类出现以来到旧石器时代为止唯一的生存技能。其后，农业大概在一万二千年前在两河流域、亚洲及中美洲、安第斯地区出现，渐渐开始扩张取代“狩猎——采集型社会”。

因环境劣化难以维生而要侵略务农者时），便成为了世界各大文明的主要脉络。中国万里长城的修筑以及罗马帝国的灭亡等，都是这些冲突的结果。

就本书的主题而言，我们最关心的是在上述的演变当中，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发展如何？我们更可进一步把问题归结为：领导者乃至领导阶层在什么时候以及通过什么手段，可以无须从事生产而获得生活所需？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研究显示，无论在原始的“采集—狩猎型社会”，还是在最初期的畜牧和农业社会，虽然领导者在资源分配上享有特权，他们大都会继续与族人一起参与自足性的经济生产活动——无论这是采集、狩猎、畜牧还是耕种。而即使部族的成员会向领导者献上各种物品，这些物品基本上属锦上添花，而不会完全等于生活所需。（相传我国尧舜时代，身为“共主”^①的尧、舜便亲自下田与民耕作。）

领导阶层如何转化为统治阶层

然而，随着农业社会不断发展，这种情况很快出现了变化。由于粮食出现盈余导致人口增加和社会分工，领导阶层也随之不断膨胀，并出现了专职的祭司阶层以事神职、专职的战士阶层以备防御以及各级官吏以解纷争等。而通过制度化的武力，领导阶层逐渐转变为统治阶层。

统治阶层与领导阶层的最大分别在于，它的成员不会直接参与经济生产活动。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所需，必须由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供给。上文提到的“向领导者献上各种物品”，遂由一种自愿性（或半自愿性，只因为其

^① 共主，亦即宗主。自人类文明早期阶段、国家形成过程中或产生国家以后，各个部落或共同体共同承认的首领，或封建时代各个王国、诸侯国共同承认的中央政权，现在也叫宗主国。

他人这样做)的行为,变为一种制度化的、强制性的行为。这种行为我们称为纳贡,而制度则称为贡赋制度。留意在货币出现之前,这种纳贡自然以实物进行。但即使在货币出现以后,在一段颇长的时间里,无论中外的贡赋制度皆仍然以实物为主。

贡赋制度当然便是后来税收制度的前身。我们现在开始接近问题的核心了,那便是,统治阶层向广大人民征税合理吗?这个问题即使没有一万年也至少有六七千年的历史,有趣的是至今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然而,在古代,一个不愿纳贡(纳税)的人还可以隐居深山,今天,任你住在哪儿,拒绝纳税已被定为一种犯罪行为。也就是说,税收的合理性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大,随时可以写上数十本书(实际出版的书籍当然不止此数),但这儿令人最感兴趣的,是当中所涉及的“压迫”与“剥削”的问题。这正是下一章要探讨的。

第二章

“压迫”与“剥削”的历史

“

日益贪婪的统治层变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而剥削则成为了人类历史的一个主调。

”

我们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压迫”（oppression）与“剥削”（exploitation）的观念是随着生物意识的发展而不断提升的。例如我们不会把蜜蜂和蚂蚁的社会形容为一个充满着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但假如一个类似的社会在人类世界出现，我们将会因为它所包含的压迫与剥削而感到震惊和义愤填膺。

让我们回到上一章所提到的狒狒社会结构。对于领袖所拥有的特权，其他狒狒当然不会懂得问是否合理。对于数百万年来的人类祖先，情况相信也是一样。一个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是，人类的意识要发展到哪一个地步，才会懂得问这个问题？一百万年前？五十万年前？十万年前？一万年前？五千年前？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懂得问是否合理，其实已经隐隐包含着“有可能不合理”这个答案。在全面的文化意识制约底下，对于我们自幼便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例如数千年来的世袭帝制），我们根本是“问也不懂得问”。

必须指出的第二点是，所谓合理还是不合理，很大程度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以下让我们做出较深入的分析。

人民需要“缴纳”多少才合理

在上古的人类社会，社会成员向领导阶层纳贡，这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就以我国做实例，井田制下的农民除了耕作属于自己的一块田外，还要八户人家一起无偿地耕作同等面积的另一块田，而种植所得全归政府。简单的计算显示，这种制度下的相应税率是百分之十一点一。

从原则上说，领导者因为要专事领导工作而不能直接从事生产，他（们）的生活所需于是由社会上其他成员合力提供，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安排。当然，每个社会成员要“缴纳”多少，是一个复杂的具体问题。问题的答案端视乎：

- （一）社会的富裕程度有多高？
- （二）社会的整体人口有多少？
- （三）政府的必要开支有多大？
- （四）领导者的生活水平怎样才算合理？

让我们逐点看看。如果社会富裕程度很低而每一成员的所得仅堪糊口，则即使税率很低也会构成“压迫与剥削”，这是第一点。如果社会人口很大（例如由数十人的群落变为数百人的村庄再变为数千、数万人的部族），每户人家即使缴纳很少的贡赋，也会得出很大的政府收入，则高额赋税便不合情理，这是第二点。这一点当然与下一点的政府开支有密切关系：政府无为而治自应轻徭薄赋，政府职能众多（国防、治安、司法、基础建设、教育、医疗、科研、文化、退休保障……）则税率便无法太低。这是第三点。（这

当然牵涉到自由经济学派有关“大市场、小政府”的争论，我们在本书后面会再做探讨。)

领导人生活较一般人优裕是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会接受的，但如果他们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如纣王的酒池肉林），则会引起公愤。如果大部分人的生活都相对富裕，人们也许还可容忍一时，但假如大部分人都生活拮据，则这种愤怒便可能引致骚乱甚至令政权不稳。这是第四点。

剥削是人类历史的主调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们说压迫与剥削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假如一条村庄的人要合资建造一座堤坝以防河水泛滥，或只是兴建一座神庙以供奉神灵，则他们即使很穷，也会自愿地省吃俭用集腋成裘。如果领导者的生活水平与大部分人差不多，则这时的贡赋比率即使颇高，人们也不会觉得受到压迫与剥削。

综上所述，在同一个社群内，当权者是否对人民进行压迫与剥削，当由三个因素所决定：

- (一) 他们的生活水平超越人民多少？
- (二) 政府的开支是否用得其所？
- (三) 贡赋对人民的生活水平影响有多大？

这三个因素固然有其独立性，但在历史上却往往一起出现：例如当权者穷奢极侈（因素一），同时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因素二），最后是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因素三）。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自愿性（相反来说即强迫性）的程度。秦始皇之修筑长城，对保护国家人民来说自有其必要性，但他对人民的劳役过度

也为千古所批判。

上述的“用得其所”这点其实十分重要。按照“社会契约”的观点（请参看本书第二部分第五章），贡赋其实就是领导阶层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契约（承诺）关系。政府收税后，有责任保护人民的安全，包括不受外敌侵略、维持社会治安、推行基础建设（修桥筑路、兴修水利）、在天灾时进行赈济等。

明白了问题的复杂性，或者我们可以将问题再简化：“压迫”是强迫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而“剥削”（指统治阶层对被统治的人而言），则是指人民缴纳的赋税令当权者的生活水平远超人民的水平，或人民纳了税但生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从这个角度看，自有文明以来，剥削便一直存在，即当权者其实可以生活得朴素一点而令人民的赋税轻一点。当然，剥削的程度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可以有颇大的不同。

剥削的起源也有其独特的逻辑。在群落规模不大和生产力不高的年代，“十取其一”（或二十取其一）的贡赋可能算是合理。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生产力提高，每人（或每户）继续“十取其一”的话，领导者的所得便会迅速膨胀。于是酋长那稍大的屋子便变成了皇帝那金碧辉煌的宫殿。在理想的世界，税收大幅增加后，税率应该可以不断降低，但谁会抗拒愈来愈丰裕的生活呢？我们说“权力使人腐朽”，其实财富不也一样？于是统治者的生活由丰裕变为豪华、由豪华变为奢侈。日益贪婪的统治阶层于是变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剥削成为了人类历史的一个主调。

留意我们迄今所分析的，都是一个社会之内的、制度化的压迫与剥削，而没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欺压、迫害与掠夺（如山贼或海盗的掠夺）。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历史篇”之中，我们将会把这个概念延伸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压迫与剥削。暂时而言，让我们引入以下有关剥削的定义：“所谓剥削，是制度化的、对别人额外劳动成果的无偿（过度）占有。”当然，所谓“制度化”的背后，仍是有如山贼或海盗的暴力，但这种暴力是较为间接